



■ 视点聚焦

全民分红 到底现不现实?

“应该给全国人民每人分红 1000 元”——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年初在上海两会上提出这一提案后,“全民分红”就一直成为舆论热议

的话题。《青年参考》3月3日一篇“新加坡财政盈余达 64 亿新元,政府决定给国民发红包,21 岁以上国民人均可拿到 2000 元”的报道更

让“全民分红”成为了两会上的热点话题。数据显示,我国去年财政收入达到 5.2 万亿元,超出年初 4.404 万亿元的预算目标近 8 千亿,在

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是否应该仿效新加坡这样给全民分红?中国的全民分红到底现不现实?都成了最现实、最强烈的疑问。

■ 观点交锋

正方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
钱落百姓口袋才最现实**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明确显示:“我非常赞成这个做法,就是要让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虽说政府投入医疗、教育等也是分享改革成果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发红包的方式更直接、透明,更可以让老百姓真正感觉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他同时指出,如果全国人民每个人都一个标准、都分 1000 元,这是一笔很大的财政支出,这并不是很合适。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 1000 元喝茶就没了,而有的地方几百元就是很大一个数字,所以执行起来可以考虑各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金额。这笔钱中央政府可以出一点,地方政府也可以出一点。

**全国政协委员霍震霆:
是该让百姓分享成果了**

全国政协委员霍震霆表示,目前确实存在工资低的问题,百姓需要分享发展的成果,当人们年纪慢慢大了,也很需要完善的保障体系。中国发展得很快,应该多考

虑一下,趁这个机会让百姓享受一些发展的成果。

**全国政协委员吴鸿:
能差别发红包就更好了**

全国政协委员吴鸿建议,财政部拿出一个与税收增幅相适应的工资增幅比例,让工资按一个稳定的比例随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并且使这个增长机制落实成一种稳定的制度。除此以外,再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出一些应对突发事件的临时补贴政策。如果能参照香港的做法,针对不同收入和层次的人群“派红包”,体现不同的人文关怀,让全民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更好了。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
用来改善公共服务更好**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表示,“全民每个人发 1000 元”的建议是个好想法,但操作起来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还值得研究。“财政增长的成果应该由人民共享,但人民共享的方式不一定是发钱,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把这笔钱用在社会保障、提高医疗教育水平等民生事业上。”

国库留得住钱,才能全民分红

■ 第三只眼

现阶段,国家财政以现金的方式直补国民到底有没有可操作性?我的看法是没有,甚至连直接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国至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政盈余”。虽然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们的政府部门几乎年年都“带着过年的心情”宣布 GDP 与财政收入的递增数据,但关于“财政盈余”的数据,似乎总是羞于启齿。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如果查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家“财政盈余”数字,基本都比较容易,但查找国内的相关数字却有些吃力。

包括“刑普提案”在内的民意“分红”诉求,主要根据在于国家财政连年增长,而且幅度很大。2003 年,我国财政收入首度突破了 2 万亿元,2005 年突破了 3 万亿元,2007 年突破 5.1 万亿元。但经济学上的财富增长

决不是收入的增长,而是利润的增长。新加坡的分红基础取决于财政丰厚的“净利润”。如果没有这一显著的“净利润”,则表明,政府的主要收入还将处于不断的投入中。

我国要想实现“刑普提案”中的现金分红,至少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运行正常。显而易见,有关这些方面的发展现状,我们尚处在“初级阶段”,很多领域都还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是财政预算制度健全,科学而透明的预算制度推动“财政盈余”成为各级政府的普遍追求。毋庸置疑,眼下不少地方财政是“盈余”不足,“赤字”有余。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财政对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公费旅游等消费向来宽容;另一方面,“岁末突击花

钱”的潜规则,也成了“烧钱”普遍现象。例如,一些单位在年终时发现年前预算的钱没有花完,于是把余额花掉。对此,财政部门大多持鼓励态度。在今年的广东省两会上,原广州地铁老总卢光霖提到,地铁 2 号线的概算是 106 亿元,结算时只花 88 亿元,省了 18 亿,卢光霖却挨了批评;广州市海珠区整治一条河,钱没花完,将余额上交财政时,人家却说“怎么还剩一千多万?效果不好!”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但愿,正在修订中的《预算法》能够克服种种弊端,真正充当好国库“看门狗”的角色。因为,只有当国库留得住钱,向国民分钱才有可能。

(樵樵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反方

**全国政协委员刘克茵:
调高个税起征点更现实**

全国政协委员刘克茵认为,香港、新加坡的做法不一定适合中国内地。“如果觉得个人收入比较低,增长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刚刚调整的个人所得税,把起征点调高了,那就会有更多收入较低的人不用交税了,这种方式,不比征多了税再把钱发给大家更好、更容易操作吗?”

**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
三五十年内都很难分红**

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表示,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差异比较大,居民收入差距也在增加。在这样的前提下,搞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是没有必要的,应该把钱用到更需要扶助的弱势群体身上。此外,13 亿人不是一个小数字,要是真的每人发一个红包非常费时费力。归根到底,中国目前还没有发展到新加坡那样,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老百姓能够收到来自政府的红利,但在有限的 30 到 50 年内,还很难出现

这种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黄泽民:
把钱花在更紧迫的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黄泽民表示,这种全民分红的设想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颇为“无厘头”。他说,像新加坡这种地域比较狭小、人口比较可控的国家,全民分红作为国家“公司化”管理的一种体现,并不荒谬也很可行。而中国大陆人口众多,中央财政投入虽然已经堪称丰厚,但如何防止中国经济硬着陆,如何让低收入人群在更持续地获得保障关爱,都是财政投入的无底洞。

**全国政协委员李稻葵:
全民发钱让富人搭便车**

“全民发一千元,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全国政协委员李稻葵认为:“物价上涨主要影响的是低收入家庭,所以我的建议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要根据各个市的实际情况去增加补贴,补贴要跟副食品的价格挂钩。如果全民补贴的话,等于是高收入家庭搭低收入家庭的便车!”

■ 他山之石

美国退税

2008 年 2 月 7 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 1680 亿刺激经济法案,2 月 13 日,布什签字使退税法案正式生效。这一法案意味着:单身纳税人将享受一次性退税 600 美元,夫妻加倍,儿童每人补助 300 美元,不需要纳税的低收入者包括靠社会保险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和退伍残障军人也可获得退税 300 美元。

新加坡分红

2008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宣布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 64 亿新元(约合人民币 320 亿元),因此,新加坡政府决定拿出 18 亿新元还富于民,摊到每个人头上约合人民币 2000 元。新加坡政府向国民发“红包”的做法,其正式称呼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香港随即表示将仿效新加坡的做法。

现代快报两会报道

江苏都市网
www.js.cn

特别联动

■ “快报记者跑两会”博客

今年的两会更开放 “洋记者”采访更方便

昨天上午 11 点,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我们 10 点 15 分进入新闻发布厅时,里面已经挤满了记者,外国记者的身影随处可见。

来自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的孙文华已是第二次来报道中国的两会。“这次两会恰逢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是十七大后首次召开的两会,也为我们世界媒体提供了很多话题:大部制改革、经济、民主进程、奥运、环保……”跟我们攀谈时,小伙子显得很兴奋。当我们问他,与第一次采访相比,对这次的采访有何感触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觉得更开放了,以前我们外国记者采访不容易,可是现在有很多机会采访,像今天的发布会。”

这是一次更加开放的两会,对此,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柯舍夫更有发言权。柯舍夫用非常流利的汉语告诉我们,他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采访中国的两会,“方便和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两会期间,发改委等很多重要部委的负责人都会接受记者提问,柯舍夫评价“这很好”,去年两会期间,他就递交了三份采

访申请,其中两份都获准了,让柯舍夫顺利地完成了采访,而今年他已经想好了自己的采访目标——中石油的负责人。

俄通社—塔斯社的记者索洛维也夫感到“今年的采访很方便”,想要采访,只要与两会新闻中心联系即可。据悉,截至 3 月 3 日,已经有来自 42 个国家的近 850 名外国记者报名采访两会,比去年增加了很多。

昨天,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在回答美国彭博新闻记者的提问时也介绍说,两会中对中外记者一视同仁,新闻中心向所有记者开放。只要外国记者向新闻中心联系,就可以进入代表团的驻地进行采访。

这次两会展现出的开放度引起了很多西方媒体的注意,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美国之音”3 月 3 日在报道中说,“中国政府努力向中国公众和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开放,比如小组讨论会向中外记者开放,并且首次公布参加政协大会的各位委员的身份背景。”的确,这种开放和采访的便利,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我们也已经切身感受到了。

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陈英 张淑娟

博客地址: <http://news.js.cn/zt/2008lh/index.html>



■ 一语惊人

“个税起征点应该调至 5000 元”——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认为,现在物价上涨幅度远远大于个税的调整幅度,目前的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明显滞后,2000 元的起征点太低。宗庆后代表说,1981 年职工平均月工资约为 60 元,个税起征点是 800 元,约为月平均工资的 13 倍。而 2006 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1750 元。不要说 13 倍,即使按照 2 倍测算,起征点也应在 3500 元以上。

“小产权房一刀切极其危险”——针对小产权房这一社会关注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郭松海表示,他准备提交提案,建议依法依理依情地处置好小产权房问题。郭松海认为,对于在农村原建设用地上开发的小产权房,可以经过合法程序,纳入住房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转化为保障性住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罚应确定为无期徒刑”——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认为,现行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罚只有 5 年,不仅宽度过度,而且较之贪污、受贿罪最高可判死刑,更有失公平,背离了设立该罪的初衷,建议全国人大对刑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不管身份如何变化,都要为百姓说话”——全国

人大代表、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质检员杨晓霞临来北京之前,其父亲这样叮嘱她。

“绿色 GDP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就算出来了,只不过一直没有公布,这个阻力不能说来自于统计局,或地方政府和企业,总之现在就是还没有公布”——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回答记者“绿色 GDP 什么时候出台”时说。

“浙江、江苏等发达省份可以允许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参加当地高考”——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认为,对于可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高考而言,户口问题不应再成为障碍。

“医改方案不必‘太完美’”——针对议论颇多的医改方案内容,曾经参加过国家医改方案讨论的全人大代表钟南山希望最终的医改方案要侧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卫生体系,疾病的预防和传染病防治等应该是完全公益性的;二是政府要加大投入支持基层社区和乡镇医疗机构建设,满足基层群众的看病需求。

“面对媒体监督,‘越往下越牛’,越是与百姓直接对话的基层政府越难以监督”——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说,从彭水诗案到西丰警察进京传拘记者事件,一些人利用名誉侵权对抗舆论监督的行为呈现蔓延之势,因此舆论监督需要法律或行政制度的坚定支持,才能真正发挥监督和制约作用。

户籍改革不能一年年“虚拟”下去

■ 两会时评

备受两会代表委员和各界关注的户籍制度改革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送审稿)已经形成,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

(3月4日《成都商报》) 这个情形,宛若去年。同样是 3 月 4 日,时间却需回到 2007 年。当日《北京青年报》上报道:公安部表示,该部会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 13 个部门进行了户籍管理工作综合调研,形成了《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

度的意见》(送审稿),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

这个情形,亦宛若前年。2006 年 6 月 16 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武冬立同样表示,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送审稿)也正在修改、完善之中,争取报请国务院尽快审议。

这个情形,同样宛若大前年。2005 年 2 月 24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据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茂利透露,公安部目前正抓紧调研起草户籍法,但何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尚不确定。不难发现,几年来这几

乎都是一样的表述:都是有户籍改革,都是正在对“送审稿”或户籍法进行修改、完善或调研中。从 2005 年至 2008 年,我没看出有什么本质区别。也几乎都是一样的虚拟语气:从 2005 年的“尚不确定”,到今年的“积极推进,但没有明确时间表”;同样几乎都是置身于一样的语境之中:那就是每年一度的两会背景。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年年雷同而无实质进展的表态,实在让人失望。

事实上,早在 1992 年,国务院就成立了由国办牵

头、公安部等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 1993 年 6 月草拟出了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与目标。

然而弹指 16 年过去,城乡二元式户籍制度实施已达整整 50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到了 30 周年的历史时期,公众所能得到的仍然是年复一年的不确定表述。我们不得不再问:一年一年总是疑似坚冰将融的户籍改革何时能有实质性突破?需要怎样才能真正破除部门利益的壁垒?还自由迁徙的权利于公民到底有多难? (杨耕身)